

大战略研究丛书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美〕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Richard Rosec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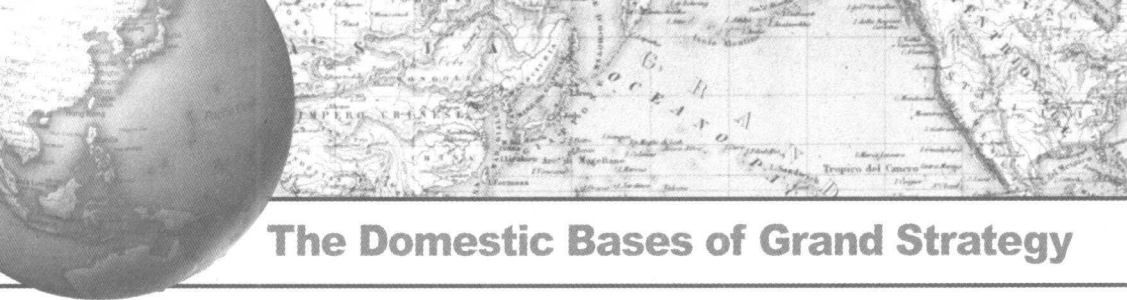
主编

阿瑟·斯坦 (Arthur A. Stein)

刘东国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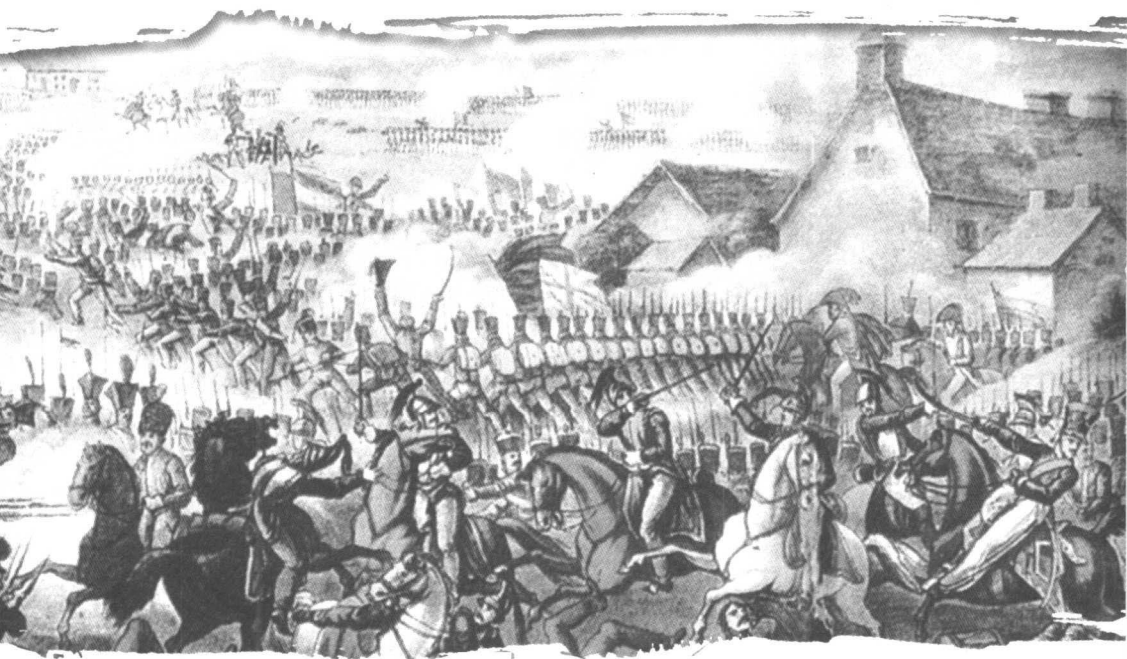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美〕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Richard Rosecrance) 主编
阿瑟·斯坦 (Arthur A. Stein)
刘东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4-136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美)罗斯克兰斯,斯坦主编;刘东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大战略研究丛书)

ISBN 7-301-09049-8

I. 大… II. ①罗… ②斯… ③刘… III. 战略学 IV. C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2233 号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edited by Richard Rosecrance
& Arthur Stei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3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书 名: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著作责任者: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阿瑟·斯坦 主编 刘东国 译

责任编辑: 徐晓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049-8/D·11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版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刷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46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总序

跨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像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ndre Beaufre)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 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而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

大战略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

非人事哉”(《伶官传序》)。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二

21 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 1978 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 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 19 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 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 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 21 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4 页。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即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鉴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

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之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本套丛书的组织得到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他们的学术指导是本套丛书在理论建构和现实价值等方面质量的保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 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

译序^{*}

自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于上世纪20年代末提出“大战略”的概念以来,西方有关大战略的理论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三个维度展开的。一是对大战略目标的争论。传统的战略思想认为战略规划的目标就是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哈特提出大战略概念的目的则是将战略目标扩展到国家安全,既包括赢得战争的胜利,也包括如何更有效地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爆发。后来又有学者将大战略目标进一步扩展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筹划与实施。^①二是对大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关系的争论。哈特和保罗·肯尼迪等大战略学者都强调大战略规划要实现目标和手段的平衡,包括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外交能力、道义力量运用能力、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利益协调和行动统筹能力等与战略目标相一致。^②人们还探讨了适用于不同能力的不同战略模式,如霸权战略、均势战略、搭便车战略、孤立战略、超越战略等。三是对大战略规划需要考虑哪些变量的争论,如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观念与道德,自然和地理等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和支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决策。

虽然本书对第一个问题也做出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大战略的含义就是调整国内和国际资源以实现国家的安全”,^③但其争论的重点主要是在后两个维度上,即大战略需要考虑哪些制约因素,如何才能实现目标与手段的平衡。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本书的内容和争论实质,还需要对新现实主义的大战略观察视角和引起的争论有一个总体的

* 感谢门洪华博士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① 有关大战略目标和含义的争论,见门洪华:《建构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2页。

② 参见 Basil Henry Liddel Hart,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Meridian, 1974), p. 322; [美] 保罗·肯尼迪著,时殷弘、李庆四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③ 见本书第一章。

了解。

一、新现实主义的大战略视角及引发的争论

虽然本书的批判对象是结构现实主义,但在结构现实主义产生之前,有关国内因素和国际体系结构因素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方面孰轻孰重的争论就已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了。

1948年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书的发表标志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成熟。在其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当中,突出强调了国际政治受到源于人性的所谓客观规律的支配,这一规律要求要以权势来界定国家利益,并按照理性算计的原则始终如一地根据国际情势的特征和内外权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和战略,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国家利益的途径是提高自己的权势,在实力的基础上兼用外交和战争手段。^④ 在此不难看出,所谓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就是各个国家对权势的追逐,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必然要受到这一规律的支配。

尽管现实主义在与理想主义的论战中取得了胜利,成为战后初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学派,但对这一流派的批评从来没有间断过。

本书的主要编辑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就是较早向现实主义理论发起挑战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63年,他发表了《世界政治中的行动与反应:国际体系透视》一书,直接对现实主义理论命题提出了质疑。在该书中,他将1740年至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历史划分为九个历史体系,并提出每一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三个变量属于构成体系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包括精英集团制定的外交政策方向、精英控制外交政策的程度以及能够用于支持外交政策的各种资源,如说服技巧,可动员的资源量和动员速度等。在这三个国内层次的变量中,第二个变量至关重要。在他考察的九个体系中有四个体系的变化是由于国内精英分子地位变化所引发的。他们试图通过采取对外侵略来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地

^④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rev. (New York: Knopf, 1978).

位,从而造成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然而,体系的稳定最终取决于第四个变量,即国际环境吸收或满足国家目标的能力。从这些历史案例的分析中他得出了与现实主义截然相反的结论:在评估国际体系的稳定时,不可能排除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系统范围的行动只有与成员国内部的政策创意产生互动才能发挥作用。系统的崩溃源自于它无法适应和解决国内原因造成的动荡。^⑤

这一观点遭到了现实主义者的反驳,批评他将国内因素的作用过于绝对化。为此,罗斯克兰斯在1973年又写作了《国际关系:战争还是和平?》一书。在该书中,他除了对自己先前的观点做了总结归纳之外,也向批评者做出了有限的让步,但总体上仍然坚持了第一本书的基本观点:尽管国内的不稳定并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但前者趋于促发后者。^⑥

1979年,肯尼思·沃尔兹发表了《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完善和发展,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又称新现实主义)的诞生。这一理论更加突出了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决定性支配作用。他认为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国际体系的根本组织原则(即无政府状态),二是构成体系的单位(即国家)之间的功能差异,三是国家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但他更加强调第一和第三因素的作用,而对单位层次的因素采取了忽略的态度。在这一体系中,各个国家本质上相同,没有差别,它们都追求权势和国家利益。因此,国家行为从根本上不取决于内部属性,而取决于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按照这一假设,国家只能按照国际结构的无政府特征而根据自助原则来制定自己的大战略,那就是建立均势以求得生存,国内因素无需考虑。^⑦

这一观点与罗斯克兰斯的观点发生了直接冲突,由此引发了两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新一轮论战。1981年,罗斯克兰斯在《国际组织》杂志秋季号上发表

⑤ Richard Rosecrance, *Action and Re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Perspectiv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3), pp. 79—93; 236—239.

⑥ Richard Rosecr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ce or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pp. 33—36.

⑦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 60—67.

了《重访国际理论》一文,对沃尔兹忽视单位层次的影响作用提出了批评。^⑧ 沃尔兹则在同一刊物 1982 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交流》一文,强调结构现实主义并没有认为单位层次的现象一点也不重要,而是认为它们在体系理论中没有其立足之地。^⑨

此后,罗斯克兰斯进一步拓展了同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战范围。1986 年,他出版了《贸易国家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商业与征服》一书。在该书中,他对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进行了新的描述,用“二元”体系框架取代了新现实主义的“一元”体系框架。认为现在的国际体系存在着两个世界:“军事-政治世界”和“贸易世界”。国际体系的这一新特征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所确立的以领土和军事力量为特征的地缘政治已经接近过时,贸易竞争取代了领土扩张和军事实力追求,贸易平衡取代了权力平衡。在跨国贸易和投资急速增长这样一个国际结构中,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这使得领土扩张变得不再有意义,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却越来越激烈。这决定了将来的国际体系特征必将是军事竞争的逻辑转向贸易和相互依存的逻辑。原因很简单,这一趋势首先来自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因为核战争时代领土征服的代价过于沉重,收益甚小。其次也源自于国内民众的选择和压力。面对成本-收益明显而巨大的反差,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会大大下降。^⑩

当然,罗斯克兰斯只是对结构现实主义提出批评的众多理论家之一。除他之外,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派在内的众多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构现实主义提出了批判。其中 1986 年由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较集中地收录了不同学者的有关文章。在该书中,沃尔兹通过对各种批评观点进行回应而进一步澄清了结构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不同。在谈到体系结构和国内因素何者更重要时,沃尔兹再次重申,体现为国家间能力分配差异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影响

^⑧ Richard Rosecrance,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81) 35(4): pp. 691—713.

^⑨ Kenneth Waltz, "Exchange with Richard Rosecr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82) 36(3): pp. 679—681.

^⑩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国家对外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国家行为因权力的差别而出现差异，其程度要超过意识形态、财产关系的内部结构或者政府形式的差别所造成的差异。在自助体系中，与意识形态偏好或者来自内部的政治压力相比，竞争的压力所占分量要重得多。”^①

在以后的论战中，体系结构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米尔纳（Helen Milner）、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阿瑟·斯坦（Arthur Stein）等人在同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中都强调了国内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②

此外，建构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还对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观进行了批判。布赞、琼斯和利特尔在《无政府逻辑：新现实主义到结构现实主义》一书中提出，沃尔兹对“结构”的概念定义得过于狭窄，认为体系的结构不能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权势分配，还应当包含一系列其他变量。其中“规则、机制以及国际组织也应包括在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之中”。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深层结构”的概念，认为系统的结构不仅包含了所谓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包含强调文化、法律和规范的国际社会体系。所谓国际体系，是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战略策划在内的综合性体系。作为体系单位的国家也不一定就是单一的按照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理性行为体，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因素以及国民的态度也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变量。因此，要将国家的实力与国家如何运用实力区分开来。国家实力的性质会影响国际体系结构。这种国家性质不仅包括技术手段（如经济发展程度和武器装备程度），而且还包括共同的准则和组织。总之，他们的结论是，国内结构影响了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单位之间的互动类型及它们的外交政策总的来说是由国内制约因素来决定

① 肯尼思·沃尔兹：《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们的答复》，载于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00页。

② 其中有代表性的争论被收集到1993年出版的论文集当中。详见大卫·鲍德温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对国内因素的讨论可参见第一章的归纳以及第四章、第六章和第十章。另见Arthur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90)。

的。^⑬

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对世界格局演变方向和国内大战略制定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为防止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对美国大战略制定的一统天下,罗斯克兰斯等人感到有必要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注入到大战略的探讨当中。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部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论战扩展到大战略研究领域。这一争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长期论战的继续。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本书是由多位作者共同完成的一部文集,全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前3章,勾画出了本书所要讨论的命题范围,其余6章实践部分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得出了与结构现实主义不同的大战略观点。

罗斯克兰斯和斯坦在第一章指出,二战后以来,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们受现实主义理论思维的影响,对大战略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只强调在国际体系结构上保持军事平衡,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一些学者对此已经提出了批评和修正。本书的目的就是在吸收这些批判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大战略概念的关注范围,探讨那些超越现实主义而揭示出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的种种因素,用具体的历史案例来说明国内不同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特征、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之所以要探讨这些因素,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前景。

本书探讨的核心命题是一国大战略的制定应考虑国内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像结构现实主义所说的那样,仅仅考虑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这些国内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和观念三个方面。

本书提出,国内政治是对国家大战略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这一

^⑬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7.

命题否定了现实主义提出的“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假设。第二章以一章的篇幅专门从理论上探讨了国内政治与国家大战略决策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各章当中,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一命题。

第二章作者多伊尔指出,由于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政治因素在美国大战略讨论中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严重妨碍了有效战略的制定。而历史经验表明,国内政治因素对国家大战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至少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首先,多伊尔指出,代表国家做出决策的政治家并不总是将国家利益最大化,有时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1879年至1892年埃及总督杜霍克勾结英国军队镇压本国民族起义的行为只能代表他个人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国家利益。马基雅维利描述的中世纪欧洲诸侯之间的对外扩张除了为求得生存安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观念上的所谓“帝王的美德”。15世纪末,西班牙的斐迪南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扩张早已超出了国家生存安全的需要,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观念愿望。在这些政治家的心目中,国家只是自己观念中的一个“艺术作品”,想把它塑造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完全不受什么国际结构的制约。

其次,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宪法特征差异也会对该国的对外战略及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多伊尔列举了康德的自由主义国家联盟来说明自由主义共和国的对外行为是受个人自由的价值驱动的,不是由现实主义所说的权势和物质利益驱动的。共同的自由价值使自由主义国家之间能够形成联盟,从而减少战争。战争只会发生于自由国家与非自由国家之间。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和平主义对外行为相反,第九章通过对日本的历史考察揭示出,日本战前的武士卡特尔联盟和战后以隐蔽形式存在的集权主义精英群体(作者称之为“软集权主义”)使日本一直遵奉着重商主义的对外战略。二战前,它是以武力为手段向外扩张,二战后改由经济手段扩张。宪法特征的差异还决定了追求大战略目标手段的差异。在20世纪初英国和德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时,英国的宪制使国家能够征收足额的税收维持军备竞赛,而德国的联邦制则使德国中央政府无法征收足够的经费。这就预先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再次,国家内部在政治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在国家外交政策上并不总是采取一致立场。国内政治力量

的分化表现为多种形式。首先是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社会党人纷纷投票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拨款,现实主义用此案例来证明国家对外政策不受党派利益的影响,本书的考察结果则相反,认为社会党人并不是按照所谓的国家利益投票,而是按社会党人的价值追求做出的选择。其次是在西方民主体制中,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也能对国家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美国和英国战前和战后的某些对外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国内民众压力的影响。第三,即使是在前苏联这样所谓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其最高决策层也存在着“强硬派”和“温和派”之争。至于哪一派能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外部竞争对手对其采取互应式的策略,支持其温和派的改革,压制强硬派。过去美国对苏联没有做这样的区分,错失了分化瓦解苏联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适时采取相应措施,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孤立发动政变的强硬派分子,最终促成了冷战的结束。

经济因素是制约大战略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变量,也是很多大战略理论家不可回避的一个争论主题。本书各章几乎都涉及到这一主题。

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说法,国家的行为就是追求权势,而权势的主要体现是能够保证国家生存安全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本书则从两个方面对这一假设进行了否定:一是否定了经济实力可以自动转化成军事实力,并根据自己的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对外做出反应的观点。二是探讨了全球化过程中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对大战略决策的影响。

本书作者提出,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总是能转化成军事实力,并依此对外做出反应。第五章对美国历史的考察表明,二战前,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对希特勒采取遏制政策,但政府鉴于国会对它的财政制约,不敢做出应有的对外承诺,出现了“扩展不足”,致使国家威慑力不足而助长了希特勒和日本发动进攻。二战后初期,美国出于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需要而做出了大量的对外军事承诺,但国内民众要求部队复员的压力和国会对军事拨款的大幅度削减使美国出现了“扩展过度”,也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履行它所做出的承诺。这些案例说明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能自动转化成军事实力,国家的对外行为也并不总是与自己的实力相一致。经济实力虽然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对外能力,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国家能做什么”。

么,而是要选择做什么”。^⑭ 这种选择往往是由国内政治因素和观念因素决定的。

战后德国和日本受战败国地位的制约,在一段时间内都放弃了对军事实力的追求,但它们又同样成了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这一现象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构成了挑战。第9章对战后日本成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探讨。现存的三种理论解释强调了不同的因素。第一种解释(即滞后性民主发展理论)似乎强调了体现为军事实力差异的体系结构因素,认为日本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受国际结构的支配而追求着同样的东西,它之所以放弃了对军事实力的追求,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选择,而是美国军事占领的安排。按照这一解释,战后的日本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大战略,只是服从于美国的战略需要。

第二种解释也强调了结构因素,但不是结构现实主义所说的军事实力结构,而是经济相互依存结构。按照罗斯克兰斯的解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深,这使得依靠军事手段的领土扩张失去了意义,而经济征服成了谋求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战后的日本正是心照不宣地奉行着这样一种大战略,将东南亚和美国等地作为它的金融和产业殖民地而大肆投资开垦。

第三种解释强调了国家内部的历史因素,认为德国和日本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它的发展规律不同于先发展的其他西方国家。后发展国家更侧重于经济发展在国家大战略中的首要地位。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重要利益集团的精英们往往形成政治联盟,不惜采用极权主义手段压制民主,结果造成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不完善。这种由少数人操控的体制容易使国家走向对外扩张。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外部环境下,扩张的手段有所不同。1945年之后日本政策的惟一重大变化是手段的变化,从军事手段转变成经济手段。

这三种解释尽管着眼点不同,但共同之处是都突出了经济目标在日本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按照第一种解释,日本突出经济目标是被动和无奈的选择,而后两种都把这种选择看成是主动的,是一种精心的大战略设计。

^⑭ 见本书第五章。

对大战略决策产生影响的第三个国内变量是观念因素。第三章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这一问题。作者约翰·米勒观察到,对冷战的起源和结束存在着两种解释:一是经典的看法,将其看成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二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看法,认为它是受美苏之间经济、军事、政治实力的分配方式决定的。米勒通过对比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冷战的兴起是因为苏联领导人信奉一种世界革命的信念,要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为这一世界革命战略提供了一个桥头堡。针对苏联的这一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形成冷战。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军事、经济实力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主要是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抛弃了世界革命的观念,呼吁东西方停止对抗,因此导致了冷战的结束。

第八章在对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进行解释时,作者奈德通过考察发现,除了军事威胁和经济竞争的因素外,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观念建构(如民族神话的编造)和仇外煽动也是造成民族主义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些结论出发,第三章作者米勒进一步提出,既然观念的变化能对世界秩序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那就应当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他具体提出了需要反思的4个概念:系统的稳定、系统的转换、权势和无政府状态。

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解,系统的稳定表现在构成系统的单位数量不发生大的变化。而实际上,大国领导人内心世界的变化(即观念的转变)也能够导致系统的转变。现实主义强调系统的转换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战争的结果是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进而建立起新的秩序。而冷战的结束不是由战争而是由观念变革实现的。权势的概念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就是军事实力,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虽然不能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强劲的经济竞争能力决定了它们同样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势。依靠这种影响力同样解决了很多重大分歧,如德国实现了和平统一。就连现实主义强调的所谓国际无政府状态也纯粹是一种观念的产物。

关于国际关系的这些观念在国家对外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各国都能抛弃旧有的观念而竖立起新的观念,就能对国际关系行